

# 从游牧社会看族群、国家起源

□ 文景

在某种更为深沉、恒久的历史动力。

在书中，王明珂为我们描述了与华夏农业文明关系密切的三种游牧社会的不同特征：在河湟地区聚居的西羌部落；蒙古大草原的匈奴游牧社会；以森林草原地区为营的乌桓与鲜卑游牧部族。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之间兴起与衰落的差异，而我们今天从这三个游牧部族的兴衰变迁中又能读到什么？

回望三大游牧部族：何以构成历史差异，我们可以从这三大游牧社会——汉代的匈奴、西羌、鲜卑（与乌桓），他们的游牧经济与社会政治组织以及他们于汉帝国往来互动之历史，了解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首先，这三大游牧社会的自然环境就决定了他们的社会以及经济基础的差异，匈奴族群以开阔的草原地区为营，西羌族群以河谷、湖畔等为居，而乌桓与鲜卑，则以森林草原为居。

不同的地理条件，造成了各部族需要在不同的季节，以不同路线、节奏进行移动和安居。自然基础也决定了农业、采集、狩猎、生计掠夺等等的差异性，而两者共同形成了三个游牧社会——匈奴、西羌、鲜卑与乌桓——人群习性、产业构成等等差异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

不同的政治制度，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群体以及国家力量，加上三大游牧部落在各自自然环境中所形成的“移动能力”也不尽相同。由此三大游牧部族与汉帝国的互动往来也各有差异。这些都共同决定了这三大游牧部族最后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匈奴部落“各有分地”，国家形态相对稳定；西羌各部族的国家边界相对不安全、不稳定；而鲜卑与乌桓部族人群则是一波波地接纳、迁徙，部族联盟不断接纳或是失去其成员，其国家形态在兴起与衰落之间反反复复。

国家何以建立？族群何以划分？我们如何

认识自身族群的形成与发展？显然，族群、国家的建立与发展，其实来自于更多复杂的因素，而非简单的历史成因便能解释，而族群彼此并无强弱之分，也无大小之分。有的只是，在不同自然环境下，人们作出的不同抉择和行动。而对于历史的考察和判断，不能离开每一鲜活的生命体运，以及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做出来的种种抉择。

《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展现出来的反思性，无意针对全面还原历史真相及因果关系本身，而是将一系列相关历史事件之由以展开的根源，追溯到中原王朝的资源边界与游牧各人群的不同人类经济生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而最终，作者希望能形成的是对整个华夏民族彼此历史的反思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周遭以及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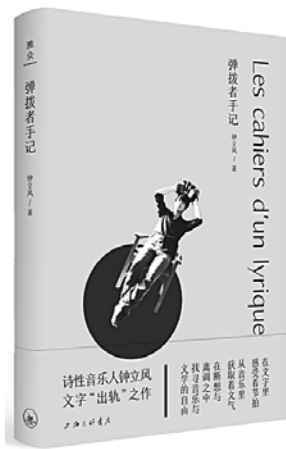
《游牧者的抉择》  
王明珂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书导读



《布鲁内莱斯基的穹顶》  
[加] 罗斯·金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这是关于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如何避开有限的人力、物质手段和艰难的自然条件，建造了一个至今仍然为我们所惊叹的建筑奇迹的故事。通过讲述历史，作者使得十五世纪的生活、传统、各种人物、社会状况跃然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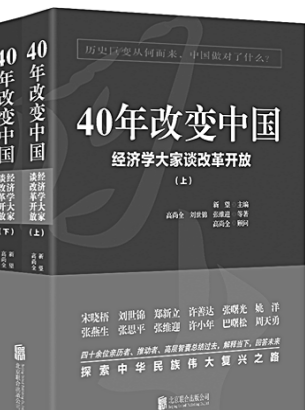
《弹拨者手记》  
钟立风 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书中文字如同音乐上的即兴表演，未必完整却足够自由，如同琴弦上产生的旋律，离奇、跳跃而充满幻想，但最终汇聚成的却是一首完整而优美的歌谣。



《横道世之介》  
[日] 吉田修一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关于青春、关于相遇，也关于成长、关于告别。小城青年横道世之介，第一次离家来到东京求学，很多未能实现的梦想，普通而平凡的故事，令人忍不住笑中带泪。



该书集通过高  
尚全、张维迎、许善达、魏礼群、刘胜军、许小年、刘世锦、巴曙松、郑新立等四十余位亲历者、推动者、高层智囊，重新检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以新的视角探讨了新时代的改革之路。

我的幸运是托中国市场化改革开放的福。正是改革开放，使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有机会享受到人类过去300年的发明和创造，即便我自己并没有对这些发明和创造作出任何贡献。这或许就是经济学家讲的创新的“外溢效应”吧！生活在世界经济共同体，真是一件好事。

据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美国的引领下开始了。如果中国晚40年实行改革开放，我就得从后半生开始，和我儿子一起同时经历四次工业革命。如果那样，我敢肯定，未来4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过去40年的实际增长率还要高，更让世界瞩目。但我还是庆幸，历史没有这样进行。

作为经济学家，在享受三次工业革命成果的同时，我还是期待着我们的国家，能在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作出原创性的技术贡献，而不再只是一个搭便车者。

（本文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所写，有删节）  
《40年改变中国》  
新望 主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让孩子爱上阅读

□ 何焱

一个人的阅读趣味和习惯往往在童年就已经播下了种子。面对这套《约读书房·让孩子爱上阅读》，让我想起童年读过的那些故事，想起那些现实一隅空间被打开的时刻，幻想的精灵们飞了出来。

比如凡尔纳的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展现了探索者的勇气和智慧，在孤立无援的地带，人类凭借自身的力量，将荒岛改造为天堂。今天的小读者，身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恐怕已经不能理解1862年就已经去世的凡尔纳在想象力的层面是如何的超前。然而，共通之处在于，作者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将持续激励着新一代的读者，传达出所谓“经典”的意义。

经典的意义还在于它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索引。童年的我凭借《海底两万里》走进了科幻小说的世界，从全息影像到时空弯曲，从老舍的《猫城记》到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科幻小说提供了另一重空间的想象。成年后读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科幻小说，比如韩松的《地铁》，一部很凶险晦涩、很卡夫卡的小说。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科幻类型，拗口，刻意制造障碍性的阅读。比如有一章叫《惊变》，讲的是地铁并没有跟往常一样靠站，而是疯狂行驶，于是，一个青年想走到车头去看看情况，却发现每一节车厢的人都在发生各种变异。小说提供了一种高科技时代不可控制的科技恐慌感，这种恐慌感也可以在一个特别轻松的日本科幻电影《夏日大作战》中找到，这些回应了现实的科幻作品是很有力量的。

非同寻常的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王德威教授谈论科幻小说时所用的“幽暗意识”一词，科幻探索着各种理性疆界外不可测的层面，是想象人性最隐秘的方法，它提供给我们各种各样有趣的奇怪的知识，丰富了我们对世界的想象和描述，满足了人类天马行空的做梦的欲望。

在《约读书房·让孩子爱上阅读》从书中，和那些曾陪伴童年的作品再次相逢。《海底两万里》那种对未知世界的热情、无畏的勇气让人心动。《老人与海》中那种的与生命极限搏斗的意志，《小王子》中对美好事物的怜爱，《彼得·潘》中无拘无束的自由……读书之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两颗心的碰撞与跨越时空的对话，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约读书房·让孩子爱上阅读》丛书

赵林青 主编  
齐鲁书社

速读

## 我经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 张维迎

第一次听说“计算机”这个名词

1978年4月，我离开老家去西安上大学。我从县城搭长途汽车到山西介休，再乘火车到西安。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见到火车。火车是英国企业家斯蒂文森父子于1825年发明的。至1910年，美国已修建了近40万公里的铁路，而到1978年，中国只有5万公里铁路。

此时距离第一台大型数字计算机的发明已经有33年。微型计算机产业正处于顶峰。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的微软公司已经成立4年，史蒂夫·乔布斯和斯蒂夫·沃兹尼亚克的苹果II个人计算机也已经上市两年了，但直到进入大学，我才第一次听说“计算机”这个名词。一开始，我以为计算机就是用于加减乘除运算的，可以替代我当生产队会计时使用的算盘。

经济系一年级的课程有一门“计算机原理”，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看到硕大无比的计算机感到很好奇。后来我知道，194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发的第一台计算机ENIAC重量接近30吨，长100英尺，高8英尺，占地面积相当于一间大教室。我们还学过二进制制，打孔卡原理和BASIC语言。但除了拿到考试成绩，整个本科四年和研究生三年期间，计算机对我的学习和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影响。

1985年，我开始在北京国家机关工作。我所在的研究所买了两台电脑，但放在机房，神秘兮兮，由专人看管，只有搞经济预测的人可以使用。单位还有一台四通电子打字机，由打字员操作。我第一次使用计算机是1988年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把自己手写的两篇英文文章拿到学院计算机房输入计算机，然后用激光打印机在A4纸上打印出来。让人无比兴奋。

1990年9月，我回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买了一台286个人电脑，从此就告别了手写论文的时代。1994年回国时，我还把这台电脑

托运回北京。但个人电脑技术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很快出现了486电脑，这台旧电脑的托运费也白交了。后来又有了桌面激光打印机，这样我就有了自己的桌面出版系统。之后还换过多少台电脑（包括笔记本电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计算机从公共教室那么大，变得办公桌上放得下（个人电脑），书包里装得下（笔记本电脑），甚至口袋里揣得下（智能手机），从而使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也能买得起，全仰仗英特尔公司于1971年发明的微处理器。有了微处理器，个人电脑才成为可能。而微处理器建立在诺伊斯和基尔比于1969年发明的微芯片（集成电路）的基础上，微芯片又以晶体管为基础。所以有人说，晶体管对数字时代的意义，相当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

晶体管是贝尔实验室的三位科学家于1947年发明的，不仅比真空管体积小、成本低、能耗少，而且不易损坏，其在消费设备上的第一个应用是得州仪器公司于1954年生产的袖珍收音机。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一位台湾来的同学送了我一台台湾产的袖珍收音机，像香烟盒大小，但音质非常好，让我爱不释手。回想起我在农村时的吱吱啦啦的有线广播，真是天壤之别。对大部分人而言，一台孤立的电脑不过是一个文字处理器，我当初买个人电脑的目的就是写论文方便。但多台计算机连接成一个网络，用处就大了。1969年，第一代互联网——阿帕网诞生了。1972年，阿帕网的第一个热门应用——电子邮件诞生了。1992年以后，我自己也开始用电子邮件了，但当时国内的人还无法使用电子邮件。1993年在筹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我们向北京大学校领导提的一个要求就是，给我们开通电子邮箱，这个愿望被满足了。没过多久，北京大学所有的教员都可以使用电子邮箱了。几年之后，中国就进入互联网时代了。

从电报通讯到移动电话

记得1993年12月我儿子在牛津大学出生的消息，我还是先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告诉国内亲戚，然后再由这位亲戚发电报告诉老家的父母。电报是美国人戈登·摩斯于1844年发明的，最初一条电报线只能发送一个频率，亚历山大·贝尔想发一条线路同时发送多个频率，结果于1876年发明了电话。1930年，美国家庭电话的普及率已达到40%，但到1978年的时候，除了政府少数高级官员家装有公费电话外，中国普通老百姓家庭的电话普及率几乎为零。我在农村的时候，生产大队的公室里有一部手摇电话，一根电话线串着好几个村，通话时必须大喊大叫才行；打往不同线路的电话需要人工交换机转接，全公社只有一个交换机，接线员是很让人羡慕的工种。

转盘拨号电话是西门子公司于1908年发明的，按键拨号电话是贝尔公司于1963年发明的（必须有晶体管电子元件）。上大学之前，我没有见过转盘拨号电话，更没有见过按键拨号电话，因为连县长办公室的电话都是手摇的。我第一次使用转盘拨号电话是在1982年读研究生期间，是校门口的一部公用电话，还是过路的一位老教师我怎么拨号的。在牛津读大学期间，偶尔给国内家人打一次长途电话，心跳比电话上显示的英镑数字翻得还快。当时国际长途电话费很贵，从牛津到北京，每分钟的费用在3英镑以上。

我第一次安装家用电话是在留学回国的1994年，也就是贝尔发明电话118年后。当时安装电话要先申请，缴纳5000元的初装费后，再排队等候。后来初装费取消了，但我早已缴过了。1999年，我开始使用移动电话，家里的固定电话就很少用了。

但很长时间，我还是没有办法和老家的父母通电话，直到老家农村也可以安装电话。我

最后一次收到姐姐写的家信是在2000年。

2006年之后，老家农村也有移动电话信号了。我给父母买了一部手机，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可惜她的信息时代来得太迟了。2008年母亲下葬的时候，我把她心爱的手机放在她身边，希望她在九泉之下也能听到儿子的声音。自从用上iPhone智能手机，短期出差我不再带笔记本电脑，也不带相机了。有了智能手机，我与父亲不仅可以通话，还可以用微信视频。父亲现在住在榆林城里，春节时能与村里的乡亲们用手机拜年，他很高兴。

2017年8月，我带几位朋友去了一趟我们村。朋友们有心，给村里每户人家带了一条烟、一瓶酒。我正发愁如何通知大家来领，村主任告诉我，他们可以在微信群里通知一下。傍晚时分，乡亲们果真都来了，烟和酒一件不剩领走了。回想起我在农村时，村支书需要用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大喊大叫很久，才能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真是今非昔比。

三辈人经历的工业革命

我祖父于1943年去世，当时只有30岁，父亲刚刚12岁。祖父出生的时候（1913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绝大部分新技术和新产品都已发明出来并投入商业化使用，他去世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

父亲比祖父幸运，他和我一起经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他下半辈子吃的、穿的、用的与祖父在世时大不相同，也与他自己的前半辈子有很大不同。他坐过火车、飞机、汽车，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也许正在看着电视、用着手机。

我比父亲更幸运，我坐火车比他早，坐飞机比他早，坐汽车比他早，看电视比他早，用手机比他早。我还会上网购物，他不会。